

武昌記輯考

天下山水奇勝處或英雄之所躋或神仙之所都或賢之所游覽故陵谷代遷而名不與之俱往好古博雅之士遺芳而舊闕疑則夏五郭公有魯史之書法在

壽昌乘

三

釣臺據土俗編云在吳城釣臺門北大江中寰宇記云武昌城下有石圻臨江垂峙四望極目寰宇記又引武昌記云釣臺在武昌城南與此不合按江表記孫權整陳於釣臺雷氏武昌記以爲權按水軍講武閱兵於此又云吳王總政之暇嘗集羣臣宴會釣魚爲樂按張昭傳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姜川使人以水灑趙德科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時昭正諫

自序

姜川 赵德科

中国方志之学，源远流长，两汉以降，代有其书，《武昌记》即其中之一也。

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曰：“《武昌记》，卷亡，史筌撰，不著录。”可见此书很早便已亡佚。尽管如此，目前还是能从部分典籍中见到它的一些佚文。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笔者共搜集到《武昌记》佚文 35 条（其中有两处原为一条，因内容互无关联而一分为二）。按现时行政区划划分：鄂州市 16 条，大冶市 7 条，阳新县 5 条，通山县 6 条，咸宁市 1 条。

隋以前，“武昌”有二：一曰县，一曰郡。武昌县地即今鄂州市，本秦汉之鄂县，魏黄初二年（221 年）孙权“都鄂”时改为武昌。这是中国历史上地名“武昌”之始。此后，武昌县名一直沿用，至民国初改为鄂城县，前后达 1700 年。武昌郡，同为孙吴所置，治武昌县，辖武昌、下雎、寻阳、阳新、

柴桑、沙羨等 6 县，范围相当于今整个鄂东南和江西九江的部分地区。六朝期间，武昌郡一仍旧贯，隋平陈寻废。据此，《武昌记》无疑是古武昌郡或武昌县的一方地记。

长期以来，人们多以为《武昌记》只有晋史筌所撰的一种。如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引载《武昌记》佚文 18 条，但在《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只记载了史筌所撰之《武昌记》。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也只说到史氏《武昌记》。今人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同样只说“《武昌记》，晋史筌撰”，而未提及其它。从北魏酈道元（？—527 年）的《水经注》引用过《武昌记》这一点来看，晋史筌《武昌记》的曾经存在，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有情况表明，在史筌之后，还有其他人曾经修撰过与之书名相同的《武昌记》。

且举《御览》为例。该书引载的 18 条《武昌记》佚文，其中就有 3 条涉及的时间不是晋代，而是晋以后。如“北济湖，本是新兴冶塘湖。元嘉初，发水冶……”“元嘉”，系南朝宋文帝的年号。元嘉元年（424 年）即东晋禅位于刘宋之后的第 4 年。又如“九宫山，……晋安王兄弟九人造九宫殿于此山，遂以为名。”晋安王，乃陈文帝之子陈伯恭，天嘉六年（565 年）立为王，祯明三年（589 年）隋灭陈后随后主入于长安。再如“钟台山，……上有桃花洞，洞侧有李邕读书之所”。李邕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有碑刻和《李北海

集》传世。显然，史筌《武昌记》作为晋人之作，是无法将上述后世之事记入其中的。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笃信《武昌记》为“晋史筌撰”，并说“史筌，《书钞》引作史筌；《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作皮零，而书中又引作史岑、史苓，异写颇多。章宗源谓，盖以形似而讹，当以史筌为是。”殊不知，该书辑录的 21 条所谓晋史筌《武昌记》佚文，其中就有《御览》中属于晋以后的 3 条佚文。

上述情况至少说明了这样几点：一、在晋史筌《武昌记》之后，的确有人修撰过书名相同但内容有所不同的《武昌记》。《御览》里头，那些属于晋以后的佚文，大都出自这部撰者姓名已佚的《武昌记》。二、上列 3 条晋以后的《武昌记》佚文，涉及区域超出了今鄂州市的范围。象这类记述包括鄂东南其他市县山川风物的《武昌记》佚文，在现已搜集到的 35 条佚文中就有 18 条，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晋史筌《武昌记》和后来撰者姓名已佚的《武昌记》，都属于六朝武昌郡的地记。三、在晋以后的《武昌记》佚文中，有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引载的“故永兴县”，曰：“隋开皇九年，黄普……领五百户住闾闾城。……至十一年，使人牛引并永兴县入富川县。十八年，改富川县为永兴县，居高陵故城。”这条佚文当属于撰者姓名已佚的《武昌记》。据此可知，该书成于隋初武昌郡被废的前后。因

此,可称其为隋佚名《武昌记》。

在宋人纂修、清文廷式辑录的《寿昌乘》中,还有另外一种《武昌记》,叫做雷氏《武昌记》。雷氏其人,《寿昌乘》未作介绍,只是在“钓台”、“石臼”、“殊亭”等条目注明“雷氏《武昌记》”云云。这3条雷氏《武昌记》佚文,都是记述今鄂州市范围以内的陈年旧事。如“殊亭”条曰:“雷氏《武昌记》云:殊亭者,唐代宗广德之元马向所作也。”早在李唐开国之前,武昌即已是郡废县存,因此雷氏《武昌记》只能是唐武昌县的地记。通过对佚文“吉祥山”条中“吴主”的考证,可知雷氏《武昌记》产生于五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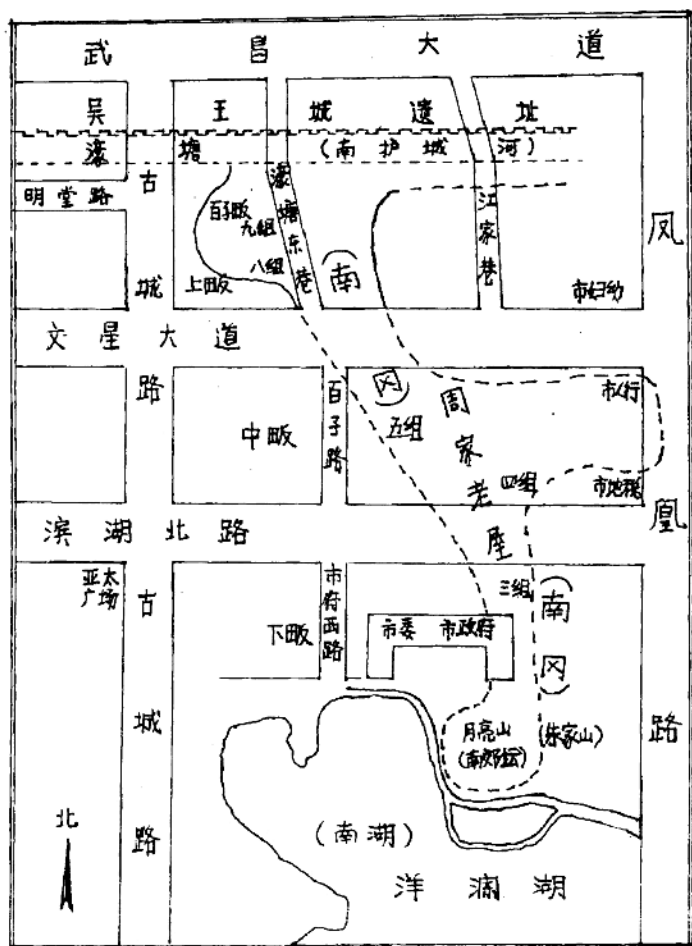
基于以上考证,笔者将搜集到的35条佚文一分为三,其中:列为甲编晋史筌《武昌记》的佚文15条,主要是事情发生在晋代以前,内容带有神话性质(这是我国早期地记的显著特征之一),被《水经注》和《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隋唐典籍引载过的佚文;列为乙编隋佚名《武昌记》的佚文12条,涉及的时间上限为晋,下限为隋,涉及范围为整个鄂东南;列为丙编五代雷氏《武昌记》的8条,包括《寿昌乘》中注明引自该书的3条,清光绪《武昌县志》和其它书中引载的内容为唐代以后的佚文。

与此同时,笔者在不改变佚文原来面目的前提下,对缺字、衍字、讹字加以适当处理,并以“()”作了标注。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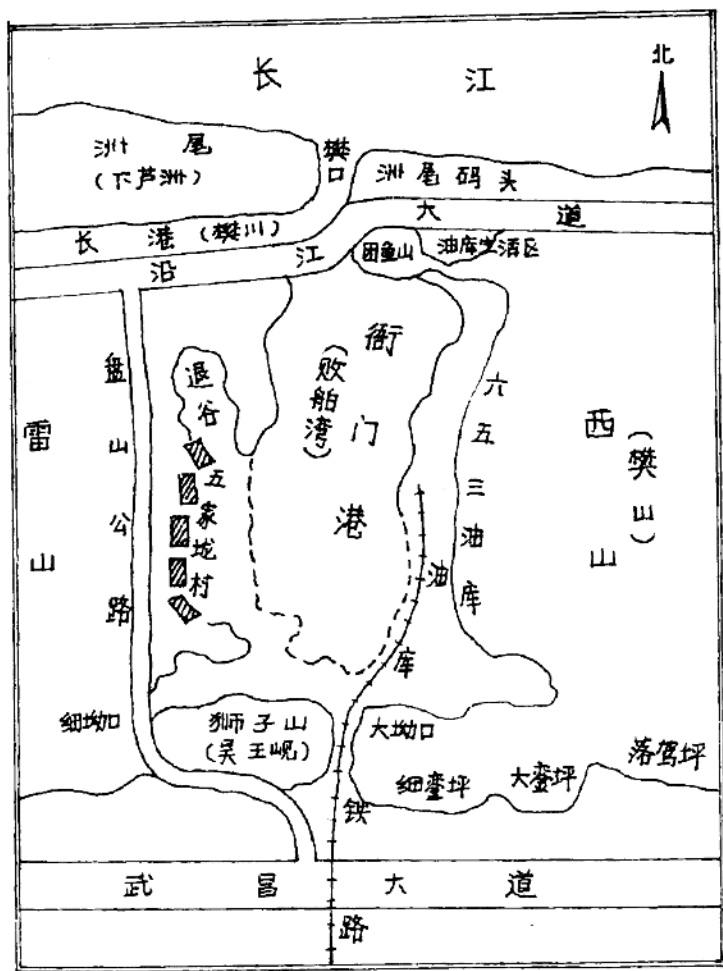
了便于检阅,对佚文原有的条目标题全部保留,原来没有的则予补上。每条佚文的后面,均附有有关的文献记载、考古资料、民间传说,以及笔者个人的见闻和见解,作为考释供人们参考。

《武昌记》佚文作为迄今所知鄂东南地区最早的乡邦文献,堪称千年遗珠,极其珍贵。开发和利用《武昌记》这一地方文化遗产,对于激发人们热爱乡邦的情操,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不揣冒昧,利用业余时间对《武昌记》佚文进行搜集、整理和考释,并理合成文,名之曰《〈武昌记〉辑考》。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岁次辛巳孟冬于鄂州市古城南路寄庐



图二 南郊坛位置示意图



图三 败船湾位置示意图

目 录

甲编:晋史筌《武昌记》	(1)
武昌郡	(1)
凤 阙	(4)
樊姥庙	(10)
南郊坛	(15)
钓 台	(21)
败舶湾	(26)
盘龙石	(32)
金牛冈	(35)
石鼓岷	(39)
龙 山	(43)
角 山	(47)
芜菁山	(47)
阖闾山	(52)
朔 山	(55)
印 山	(57)
乙编:隋佚名《武昌记》	(59)
樊 山	(59)
寒 溪	(65)

长 湖	(67)
北济湖	(70)
峻 山	(73)
千仞山	(74)
五龙山	(75)
父子山	(76)
九宫山	(77)
故永兴县	(79)
故下雒县	(81)
孟嘉墓	(82)

丙编:五代雷氏《武昌记》

钓 台	(85)
石 臼	(86)
陶公宅	(88)
殊 亭	(91)
华容寺	(93)
灵溪山	(95)
钟台山	(96)
吉祥山	(100)

附录 唐宋以前武昌历史地理资料

跋

甲编 晋史筌《武昌记》

武昌郡

(吴)大帝筑城于江夏，以程普为太守，遂欲都鄂州，改为武昌郡。其民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归建业死，不向武昌居。”繇是徙都建业。（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 170 州郡部）

《御览》载录的这条《武昌记》佚文，《太平寰宇记》卷 112“鄂州”亦有载，但其前半部分为“(吴)大帝筑城于江夏山，为江夏城，即今郡，以程普为江夏太守，督夏口，遂欲都鄂，改为武昌”，其余文字皆同。

从尊重历史真实的角度讲，上述两种不同版本的《武昌记》佚文都有需要廓清和校正的地方。

第一、所谓孙权“都鄂州”，应为“都鄂”。据《三国志》卷 47《吴书·吴主传》载，魏黄初二年(221)年四月，“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雎、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

县为武昌郡。”文中的“鄂”，即汉之鄂县，治所在今鄂州市。“改名武昌”，是指当时将鄂县改称武昌县，并作为武昌郡治。孙权“都鄂”的史实，不仅有史籍文献的文字记载，还有众多的遗迹、遗址为证。而所谓孙权“都鄂州”，则纯粹是子虚乌有。仅就“鄂州”这个地名而言，也是六朝以后才出现的。《隋书》卷31《地理志》云：“郢州，……平陈，改置鄂州。”隋平陈在开皇十九年（589年），此时孙权“都鄂”已经过了368年。《旧唐书》卷40《地理志》则谓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平萧铣，改为鄂州。”时间还要晚许多。再之，隋唐以后的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区，属沙羡县地，迄今未见有孙权于此建都的记载。事实说明，鄂县、鄂州是两个时间、地域、规格完全不同的历史地理概念，不能将它们混淆起来。

第二、吴大帝“筑城于江夏”，指的是筑江夏郡城，或曰筑武昌郡城，而不是指的“城江夏山”。《御览》、《寰宇记》两书中的《武昌记》佚文，核心内容都是讲的孙权“都鄂”，因此，孙氏的筑城与“都鄂”当有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孙权筑的不是一般的城，而筑的是东吴的都城。前面说过，孙权“都鄂”是在鄂县，即后来的武昌县。这里曾一度是孙吴江夏郡的治所。《水经注》卷35“江水”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孙权以魏黄初元年（按，应为二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又杨守敬《水经

注疏》：“《元和志》，吴江夏郡理武昌。《晋书·王戎传》，戎受诏伐吴，前锋进攻武昌，江夏太守刘朗诣戎降，尤吴江夏郡治武昌之切证。盖改武昌为江夏也。后世地学家多不知吴有废武昌郡而立江夏郡事。”江夏郡为汉代旧郡，赤壁战后其地分属孙吴、曹魏，形成南北双立的局面。东吴老将程普曾经两次担任江夏太守，治沙羡。《水经注》等史籍谓孙权曾于武昌立江夏郡，此江夏郡当是孙权“都鄂”时由沙羡移治而来，初改为武昌郡，后又恢复为江夏郡。《三国志》载魏黄初“二年四月，权自公安都鄂，……八月，城武昌”。可以说，这既是筑的武昌县城，也是筑的武昌郡城或曰江夏郡城，还可以说是筑的东吴都城。《三国志》中另外提到的“筑城于江夏山”，则是在吴黄武二年（223年）春，此时孙权“都鄂”已近两年，足见其同建都并无直接关联。再之，“江夏”作为县名最早出现在隋开皇九年（589年）。而此前的江夏山一带叫做“夏口”，为沙羡县地。应该说，吴黄武二年筑的是夏口城，而不是《寰宇记》中《武昌记》佚文所说的“为江夏城”。

第三、孙权并非先“筑城于江夏”，而后“遂欲都鄂”。前已引述《三国志》中有关记载，孙权“都鄂”是在魏黄初二年四月，而“城武昌”是在当年八月。显然，两种版本的《武昌记》佚文关于孙权先筑城、后建都的说法不符合史实。

第四、“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民谣，同孙权徙都

建业毫不相干。据《三国志》记载，孙权于吴黄龙元年(229年)夏四月在武昌“南郊即皇帝位”，是年秋九月迁都建业。此时，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业已形成，东吴北上、西进皆有困难，孙权于是以他继承父兄之业、初掌江东时鲁肃进献的“鼎足江东”、“竟长江所极”的建议作为国策，迁都建业，限江自保。而“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民谣，则是出现在孙吴末帝孙皓于甘露元年(265年)由建业徙都武昌之时。《三国志》卷61《吴书·陆凯传》：“皓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泝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于是，陆凯上疏曰：“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增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沈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力劝孙皓不要迁都武昌。《御览》和《寰宇记》中的《武昌记》佚文，都把孙权“都鄂”之后四十多年时发生在他孙子身上的事情，硬扯到做祖父的头上，这无论如何也是站不住脚的。

凤 阙

(武昌)城北有冈，高数丈，名为“凤阙”。其处显敞，胜阙以望川泽，多所远瞻。吴黄龙元年，有凤皇集此冈，故谓之“凤阙”。（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6地部）

此条佚文的后面,原接有“凤阙南十里有金牛冈……”一段文字,因与凤阙无关,故将其另列,单独考注。又唐徐坚《初学记》卷8引《武昌记》曰:“城东南角有岗,名‘凤阙’。吴时有凤集之,因以为名。”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53亦有关于“凤阙”的佚文,但文字与《类聚》少异。

阙是古代的一种礼仪性建筑。汉班固《白虎通义》曰:“阙者,所以释门,别尊卑也。”晋崔豹《古今注》曰:“阙,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多少,故谓之阙。”这是讲的是宫阙。除此之外,就其功能而言,还有城阙、宅第阙、祠庙阙、墓阙等多种。而凤阙,则是一种建筑式样比较独特的阙,即《古今注》中所谓“上有朱雀二枚”的“朱雀阙”。

史籍中关于“凤阙”的记载颇多。《史记》卷12《孝武本纪》曰:“建章宫……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19引《关中记》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有金凤在阙上,高丈余,故号凤阙。”民初熊会贞于《水经注疏》按云:“《黄图》引《古歌》云:长安城西有双阙,上有双铜雀。一鸣五谷成,再鸣五谷熟。铜雀即铜凤皇也。”众多的地面实物和出土文物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高文主编《中国汉阙》收录的现存汉阙中,有四川渠县赵家村东、西

无名阙和沈府君阙等，阙身上端皆镌刻朱雀。该书附载的大邑县出土凤阙画像砖图片，其“上画两阙，顶有瓦棱，檐下椽柱显然，阙间连梁，上栖一凤”；此外还介绍说，河南省郑州市出土有类似的“凤阙·阁楼”、“凤落阙楼”画像砖。武昌凤阙的具体形制，当与上述记载或实物近似。

《武昌记》佚文称：“（武昌）城北有冈，高数丈，名为凤阙。”这一说法，是同《武昌记》记述的武昌郡城亦即六朝武昌城的实际地理环境相矛盾的。据蒋赞初、李晓晖、贺中香的《六朝武昌城初探》一文披露，1981年至1984年，湖北省及鄂州市考古工作者多次钻探、试掘结果表明，六朝武昌城即孙吴武昌城，其“北城垣东起窑山，西迄寿山，系利用陡峭的江岸来构筑城垣，因江为池，故不设城濠”。孙吴时期修筑的其它古城亦具有同样的特点。光绪《武昌县志》引宋张舜民《画墁集》云，“润州子城、金陵覆舟山城、武昌吴王城制作一体，皆因山附险。”今人罗宗真《六朝考古》也说，“孙权早年定都武昌，其地理环境与南京有相似之处，它们俱北临长江，傍依高山，龙蟠虎踞，形势显要。”上述考古结果和文字论述表明，六朝武昌城北边紧靠长江，“因江为池”，根本从来没有什么“冈”，因而凤阙在武昌城北之说不能成立。

据笔者考证，凤阙在六朝武昌城东的偏南方向，即在今鄂州市武昌大道南侧的鄂城重型机器厂生产区内。依